

# 法国华人移民的信仰与融入： 关于天主教巴黎华人教会的调查<sup>[1]</sup>

□ 尹文涓

**摘要：**近年来，海外移民的生存处境、经济发展模式、精神生活以及当地社会文化的融入情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对巴黎华人天主教堂区进行社会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了巴黎华人天主教群体的信仰活动特点和在融入法国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处境，如他们在保持“移入地”和“移居地”双重文化和宗教身份上的努力、在拓展生存空间和寻求精神慰藉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显著世俗化功能、群体分歧、子女教育等内、外部困境，以及对他们获得自我身份认同和融入当地文化的反思。

**关键词：**华人移民；天主教；巴黎；文化；融入

**中图分类号：**B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12-0064-06

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目前有近35万华人移民生活在大巴黎地区。他们主要由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柬埔寨难民和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涌入的移民构成，他们的移民方式和在“移居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宗族和集体行为的特征。根据中国移民问题专家皮卡尔(Pierre Picquart)的观察，“他们的发展主要是在经济上，而且比较成功，应该说是融入社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融入我们的共和国”<sup>[2]</sup>。皮卡尔这里所强调的实际上是法国华人移民群体所面临的、融入当地文化的迫切需要。

本文选取了大巴黎地区的华人天主教信徒这一个案群体，从移民信仰与宗教生活的角度，考察了在法国人眼里“神秘而安静的”华人移民的宗教信仰在帮助他们融入当地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困境。融入的本质含着接受当地文化和被当地文化接受的两个层面，那么，对于巴黎地区的华人天主教教徒而言，信仰“移居国”的宗教是否会有助于他们的接受与被接受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自2009年3月至11月在巴黎华人和堂区当中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调查。<sup>[3]</sup>除此以外，本文还采用了大量

相关学者和社会团体的调查数据和资料。<sup>[4]</sup>

## 一、天主教巴黎华人堂区简史：1956-2009

天主教巴黎华人教会(Mission Catholique Chinoise de Paris)的历史和发展，是和法国华人移民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国华人移民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战期间英法政府招募的华工、战后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以及随后来法国谋生的青田商人；第二阶段是1975年前后的印支难民，其中70%以上为广东潮籍人，这批“二次华人移民”大约有145,000人；第三阶段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来自浙江、福建和东北的“新移民”，由于“新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温州地区，因此“温州人”几乎成了“新移民”的代称。<sup>[5]</sup>

由于跨国移民的流动性和部分居留的非法性，目前尚无一个关于在法华人的精确统计数据。综合中国移民问题专家皮卡尔的统计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数据<sup>[6]</sup>，目前居住在法国的华人应约为70万，大半居住在大巴黎地区。其中温州人约为25万，主要集中在3区“庙街”、11区“伏尔泰街”和19区、20区

作者简介：尹文涓，女，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讲师、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2007)、巴黎11大古典礼法中心博士后(2009)，主要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

交界的“美丽城”附近,主要从事服装和皮革加工;福建人主要集聚在13区老“中国城”附近经营餐馆与超市;东北人大部分生活在“美丽城”,但没有形成类似前两个地缘群体的独立生活区。

和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法国华人移民的发展主要是在经济上。从生活和经济模式来看,巴黎地区的华人移民具有典型的按地缘群体集居和补缺型经济方式的特点。他们依赖地缘家族群体网络和集体行动,在法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济上的成功。但与此相应的是,自1993年以来,有关华人移民的负面报道也经常见于法国各大媒体。尤其是自2000年来,法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对于华人非法移民的报道便一直不断,涉及“华人偷渡的新路线”、“中国非法移民的新犯罪行为”等诸多话题。<sup>[7]</sup>很显然,正如皮卡尔先生所关注的那样,法国的华人群体面临着接受和被接受的文化融入困境。

早在1920年代,雷鸣远(Vincent Lebbe,CM)神父就在法国成立了旨在帮助中国留学生信仰、学习和生活的“中国留学生中心”。<sup>[8]</sup>1956年前后,几位在欧洲进修的中国神父来到巴黎,巴黎枢机主教任命其中的李光华神父在巴黎10区(rue de l'Echiquier)筹设华人堂区<sup>[9]</sup>,开始了天主教巴黎华人堂区的历史。但1966年巴黎主教府决定将教堂出售,华人一度失去了在巴黎的堂区。1975年前后进入法国的印支难民也带来了一批华裔天主教徒,其中有大约20名当地的“青年会”成员,他们在巴黎重新聚集起来,并迅速和一直在华人当中工作的张联毓神父联络上<sup>[10]</sup>,成为华人堂区的中坚力量。1978年,巴黎枢机主教任命张神父重组华人堂区,在华人聚集点每月举行一次华语弥撒。这一时期华人堂区比较活跃,但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sup>[11]</sup>1983年,巴黎主教府任命王贵神父为华人堂区服务<sup>[12]</sup>,租借了3区的St Elisabeth教堂,每周举行一台华语弥撒,巴黎华人堂区终于再一次有了个临时的“家”。但由于这批移民信徒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法语基础,他们很快融入法国社会并加入到各自生活区的法国人堂区。因此,1989年乐雅正神父接管华人堂区时,据统计信徒人数“包括大人小孩在内不到70人”。<sup>[13]</sup>

但正是在乐雅正神父管理任内(1989-1994年),温州“新移民”陆续到达,其中有150名左右的温州教民归队,使得华人堂区一下子壮大起来。此时正是中国移民大量涌入之际,考虑到张联毓神父在华人当中的影响,巴黎主教府再次任命他为本堂神

父(1994年)。在此期间,福建和东北新移民中的信徒也逐渐加入到堂区中来。2002年,张神父任职期满,巴黎教区任命了一名来自新疆教区的神父为华人堂区服务。2008年,另一名来自河北献县的神父接任本堂神父。华人堂区的壮大使得巴黎枢机主教决心为堂区建立一座属于华人自己的天主教堂。这座设计现代的“中华圣母堂”(Notre-Dame de Chine)于2005年圣诞节投入使用,面积为55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约200人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雷鸣远神父在巴黎中国留学生当中开展的工作,到2005年华人堂区自己的教堂落成,巴黎主教府、法国地方堂区、巴黎的传教机构、法国传教士乃至法国民间力量都在其中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据统计,目前在大巴黎地区同时认可华人与天主教徒身份的移民信徒约为1,000人,其中大半为温州人。由于早期移民信徒已经融入到法国教堂,目前归属华人堂区的信徒约为600人,定期到华人教堂参加弥撒的约为350人。此外,华人堂区每年受洗人数保持10-15人的增长,大多是温州、福建移民的第二代,偶尔也有留学生或东北人。“中华圣母堂”落成后,华人堂区还是保持分别在两个聚集点活动的局面。生活在老中国城的福建、广东信徒每周日上午到13区“中华圣母堂”做弥撒,人数约为100人左右;生活在巴黎东北部的温州信徒则在下午到3区的St Elisabeth堂参加弥撒,人数为220人左右。两处弥撒都由同一位中国神父主祭,使用从大陆运来的中文圣经和歌本,每次都准备了中文材料。神父使用普通话主祭,在安排教友读经时,大部分用普通话,有时也会用潮州话(13区)或温州话(3区)。

## 二、世俗化和本土化:双重身份的困境和空间

目前定期到“中华圣母堂”和St Elisabeth堂参加弥撒的华人信徒基本上都属于“新移民”,大多来自中国传统的天主教地区温州、莆田等地,基本上在来法国之前就已经信奉了天主教。由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洋教”身份,因此关于中文语境中基督教本土化问题的讨论,通常都是如何将“洋教”移植到中国文化表述中去的问题。然而,与国内的基督徒处境不同的是,巴黎华人堂区的教徒由于其“移民”与“洋教”的双重身份,所面对的是要将“洋教”移植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他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异域”文化的双重处境。这一点也是他们有别于巴黎地区其

他信仰中国传统宗教的华人、或其他来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移民的地方,这也正是海外华人移民信仰问题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所在。

在华人堂区的信仰与身份这个问题上,法国社会以及巴黎教会的政策是鼓励保存移民所带进的民族文化,认为这种政策会保留移民的文化资产,从而巩固移民团体的自信和自我认识。因此,巴黎教会比较支持华人堂区保留其“中国”文化传统特色,并积极参与了堂区的相关活动。从堂区的圣事活动安排,也可以看出他们在保持“移出地”和“移居地”双重文化和宗教身份上的努力。一方面,他们尽量保留中国传统宗教和节日的文化象征,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堂区在弥撒中都会有特别的祈祷和活动<sup>[14]</sup>;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试图将他们的信仰跟“当地”的传统靠近。每年夏天到路德等地朝圣是堂区的重要活动,每次都有近200人参加。在保留天主教传统仪式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当地的法国人堂区更为积极,如2009年的圣桂枝节,法国人一般只是在进教堂时象征性地领取一支树枝,而华人堂区则还举行了“拜苦路”、“桂枝游行”等仪式。有意思的是,华人堂区的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法国人的关注和参加,这说明当地社会对华人堂区无论在保留“移出国”还是“移居国”文化传统方面的努力都是比较认同的,这也帮助了华人信徒获得自信与与地方文化的融合。

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将他们的信仰与“移出国”和“移居国”文化双向融合这一点上,堂区信徒将信仰本土化到对“移出国”文化表现出并不热心的态度,在春节祭祖弥撒活动中,最后上前去烧香祭拜的是对此感到好奇的法国人比华人多;而当堂区准备雕刻一座“中华圣母像”时,很多华人对最后由巴黎教会和堂区设计的塑像并不满意,认为那尊抱着婴孩的中国妇人长得太像中国的“观音”。相反,在保留如圣体圣血节这一在现代法国已经不再流行的传统圣事活动上,他们则显得比法国人更为积极。

对此笔者的理解是,堂区信徒大多来自中国传统天主教地区,他们对天主教传统的固守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对自身文化传统风俗的认同;而当他们到法国后,在异文化当中信奉“异教”虽有疏远自身文化传统的身份认同危险,但相较保守自身文化传统而不能融入当地文化和教会、以及与他们后代(已经融入当地文化)沟通的困难,移民信徒在现实

压力下,会更加倾向于将“洋教”移植到“移居国”的“洋文化”中去,表现出这种强烈的“回归”当地文化传统的现象,坚持那些甚至在法国已经不再流行的宗教仪式。很显然,在将“洋教”融入何种文化传统的诉求上,华人移民信徒与国内信徒的处境是不一致的。

如果说“移民”这一鲜明的身份特征和现实需求,使得巴黎华人天主教徒所面临的本土化处境远比国内信徒复杂的话,那么在实际的世俗生活层面,华人堂区在帮助华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张联毓神父就一直在巴黎华人天主徒当中工作,曾两度任本堂神父,是巴黎华人堂区历史的见证者和守护人。下面是笔者在一次晚祷后在St Elisabeth堂和张神父约见时遇到的场景:

教堂的二楼有一个简陋的小房间:一个年轻女孩在一台电脑前工作,一对中年夫妇、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一个单身的中年男人。就是刚才晚祷时在后排等着的那几个人。大家都不说话,互相不打招呼。我和他们打招呼后,看出他们不想和我说话的样子。一会神父过来,年轻女孩非常不耐烦地催着他填了几张表。张神父一边脱掉袍子,一边问大家有什么事——看来大家都是来求神父办事的。第一对夫妻是有个交税的单子要找神父签字,神父填了大概半小时;带孩子的男人,是租房子的问题,神父说已经联系好了,先等别人搬家;单独的男人,在等着神父帮他弄一个店铺的批号,神父说还没下来,要他第二天打电话再问。<sup>[15]</sup>

这个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人移民的紧张、疏离感与现实需求、以及华人堂区的世俗功能。看得出来这就是晚祷之后张神父的工作,神父和大家都对此习以为常,这也是张神父50多年来在华人堂区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张神父1994-2002年任本堂神父期间,500多名温州籍教友在华人堂区的协助下获得了法国的合法居留身份。

为了帮助堂区和周边的华人解决一些生活和咨询方面的问题,堂区在中华圣母堂临街的房间设了一个接待室,符大姐每周五下午在这里做义工。符大姐70年代来法国,是当时华人教堂“青年会”的成员之一。这批人现在都已经融入到法国地方的堂区,但她仍然会经常过来参加华人堂区的活动。在笔者约见她的某个下午的3个小时里,她一共接待

了4个人:

第一个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她来法国不久,过来打听怎么往国内寄钱,事后我问她怎么找到这里,她说听说教会是“做好事的地方”;第二个是东北人,他有一个小公司,想找人帮忙做一天陪同翻译;第三个是位越南中年女人,看上去已经生活安定,她是想换掉家里的保姆;第四位是位老人,普通话很标准没有口音,看上去很绅士的样子,他拿了一些送到家里报箱的优惠券,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当听说没有什么用后,他接着打听退休政策待遇和政府补贴等,听上去他在法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工龄还是不够,享受不到那些待遇。他有些失望,但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和笑容。<sup>[16]</sup>

这就是符大姐一个下午的工作,她告诉我每次的工作内容差不多都是这样。

晚祷之后的张神父和周五下午做义工的符大姐,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华人解决一些语言和生活上的困难,帮助填写各种报税与补助申请表,似乎都和牧灵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毫无疑问这些工作是出于堂区华人在异域生活的现实需要。从当时的语境可推测符大姐接待的这4个人都不是堂区教友,由此可见堂区的这一工作并不仅仅是针对内部信徒,而是面向整个华人群体服务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法国移民机构的压力。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执行的正是教会世俗与神圣的原始职能——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然而,正如下文将要述及的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堂区不会因此面临过度世俗化的风险。

### 三、谁是我们的邻居:困境与原因

在对华人堂区进行跟踪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刚开始感受最强烈的是堂区内部温州和福建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新落成的教堂不能同时容纳近350名固定上教堂的教友,但这不是温州信徒和福建信徒分开在3区和13区做弥撒的原因,一名曾经协助教堂工作的神父说“他们完全可以都到‘中华圣母堂’做弥撒,分上下午举行”。但是现在这两个教堂的人互不往来,即便是春节祭祖弥撒、中秋节游园这样的活动,堂区神父也是小心翼翼地在两个场点分开举行。除了共用本堂神父和“天主教巴黎华人教会”这个名字外,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宗族和地域分歧远比在母国时明显。

华人堂区自1989-1994年乐雅正神父任期内开始在3区和13区两个教堂同时举行集会,当时是为了考虑两个地区教民的交通方便,而且乐雅正神父可以为13区的老广东移民举行粤语弥撒。但这一权宜之计很快就显示出它的局限,随着温州和福建这两个新移民群体的到达,并随即按着宗族和地缘差别在巴黎形成不同的竞争性经济产业和生活区,华人堂区的信徒也按照经济与地缘分类形成了三个对立的群体:早期印支移民和后来的大陆新移民;温州人和福建人;南方人和北方人(东北人)。新移民归队的时候,正是早期印支移民群体离开堂区的时候;温州人和福建人两个移民群体在抵达之际就开始了他们在巴黎华人内部的经济竞争;最晚抵达的东北人发现他们不被任何一个南方人群体接受,“他们刚开始来(教堂),后来就不来了”<sup>[17]</sup>。

巴黎教会这时修建“中华圣母堂”或许也有将堂区华人统一到一座“教堂”的考虑,以便培养堂区信徒的团体感与归属感。但矛盾随着新教堂的落成而加剧,温州教民很快发现13区的福建教民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了新教堂的主体和主人,他们只能继续租借3区的St Elisabeth堂集会。除了教堂产业,还有教堂下属中文学校管理权和利益上的分歧<sup>[18]</sup>,这些分歧严重到对神职人员的控制。对此,一直代表巴黎外方传教会协助华人堂区工作的沙百里神父的观察是:“由历史和族群原因导致的内部分裂、不同利益派别对神父任选的干涉、信徒之间缺乏沟通导致的误会等种种问题,使得华人堂区很难成为一个纯粹的信仰群体。”<sup>[19]</sup>

正如沙神父指出的那样,神职人员的任选是华人堂区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堂区的神父由巴黎教会指派,巴黎教会也很重视华人堂区的需求,譬如印支华人来法时,就委任了王贵、乐雅正神父为堂区服务,是考虑到他们曾分别在柬埔寨和广东任传教士的经验和语言优势,以便更好地在印支华人信徒当中开展工作。但随着新移民信徒的到来,派别分歧、教友的信仰和文化背景、不同的牧灵方式等因素,都使得堂区群体的形势和需求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自2002年起,巴黎教会开始和中国爱国教会积极“对话”和协作,委任了来自中国爱国教会的神父任本堂神父,这使得堂区出现了内地来的神父能否被早期教友认同的新问题。<sup>[20]</sup>这一情况和中国国内的宗教现状和历史有一定的联系,但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夸大了,有相当一部分

教友便是以“宗教迫害”的理由申请到居留。当然,需要反思的是迫使他们在面临现实生存处境时夸大这一问题的原因,很显然这样的说法迎合了一部分法国人对中国宗教状况的想象,在“中华圣母堂”的祝圣典礼上,中国国内的宗教压迫仍然是话题之一。但不管怎样,在巴黎仍然强调教会的分歧或者将宗教与政治联系起来,对于巴黎华人堂区内部的和解与长远发展显然没有任何的益处。

堂区信徒所面临的另一困境是移民二代的教育问题。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接受访谈的堂区领袖脸上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sup>[21]</sup>在他所在的温州信徒群体中,90后出生的孩子占总数的2/3,包括移民过来和在这里出生的两种。移民过来的孩子往往心理上有被遗弃的感觉,他们普遍法语不好,跟学校和社会的融入非常困难;而在法国出生的孩子虽然较易融入法国社会,但是他们大多不会温州话或普通话。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孩子都存在与父母沟通的困难,因此不容易通过父母的影响接受父母的信仰。这使得温州教区的传统家庭信仰模式受到很大的冲击。

此外,巴黎华人堂区还面临着信徒比例低、数量增长缓慢的问题。巴黎华人天主教信徒的比例不到总移民的0.3%,明显低于巴黎地区基督新教徒的比例(2%)和国内天主教徒比例。面对这样的事实,各个受访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老信徒认为这是缘于新移民内部群体冲突,以及“温州人、福建人没文化,教育差,忙于赚钱,对宗教没兴趣”<sup>[22]</sup>;老神父认为需要在留学生当中展开工作;年轻信徒则认为牧灵方式不够活泼、内部分裂等等。当然要看到的是,法国总体的天主教信仰氛围也在日趋淡薄。根据《世界报》公布的法国人2007年信仰状况统计,法国人只有5%的人信仰天主教且经常上教堂。<sup>[23]</sup>

除了内部的困境,华人堂区与本地教会的融合也不是十分顺利。就在笔者即将结束调查的时候,堂区的温州人还在为能否继续租用St Elisabeth教堂而交涉和苦恼——不得不租用教堂和租不到合适的教堂,实际上是天主教巴黎华人堂区在过去的50多年中所面对的一个老问题。对此,比利时著名中国学专家钟鸣旦指出:“在巴黎并不是没有合适的教堂可供中国人租用,根本原因在无法合用厨房”<sup>[24]</sup>,法国教堂的厨房不适合中国人的烹饪方式。或许厨房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不能使用厨房或者没有一个中国式的厨房,前来参加弥撒的堂区华人便失去了

一个“中国式的”与亲友聚会和交流的重要机会。<sup>[25]</sup>问题是,在某种意义上厨房或许也是一种象征:巴黎教区的华人和法国人,是否最终能够坐在一起分享充满祝福的“鱼”和“饼”?

#### 四、反思:信仰与融入的可能

社会学家认为,宗教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和文化的身份诉求,对于不同群体间的融合和认同往往会起到积极的桥梁作用;但信仰同时也可能会成为消极的、群体内外部之间界线森严的“堡垒”。<sup>[26]</sup>在访谈中,华人堂区的信徒对于他们的信仰是否有助于融入法国社会这一问题上均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信仰“移居地”同样的宗教为他们理解和接受当地文化、以及被当地人认可等方面均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而且很显然,在帮助华人信徒保持“移出地”和“移居地”双重文化身份、解决移民生存现实需要和建立起一个纯粹的华人信仰群体等方面,巴黎教会、华人堂区和当地社会均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来自堂区内部分歧、与本土教会的融合、移民二代的牧灵方式等方面的压力。

对于堂区华人而言,完全融入法国社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们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显然他们目前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经济上依靠宗族网络和补缺模式为他们谋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过度依赖这种单一的经济和生活模式使他们所获得的只是一个异域的地缘“村落”,不仅不利于他们真正参与到法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还会因为其造成的冲击而影响到他们被当地社会所认同。<sup>[27]</sup>宗族经济网络形成的内部“堡垒”还会导致华人信仰群体之间的分歧,是华人堂区内部出现地缘群体分裂的根本原因;更严重的是,群体网络会有将堂区的作用和功能进一步推向世俗化的危险,他们的信仰在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也有被世俗化和利用的严重倾向。堂区对此应该有所警惕,将更多的重心放在引导教友培养纯粹的灵性生活和宗教情感上来。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对于巴黎的这个新移民群体,他们不仅存在皮卡尔所言的“没有融入法兰西共和国”的问题。或许,我们也并没有“将他们融入”。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社会,“温州人”都是一个伴随经济冲击带来的让人警惕的名词。在访谈中,他们也承认自身对法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往往也是被欺

压甚至是打劫的对象。<sup>[28]</sup>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他们的形象和地位也是和“温州商人”、“温州炒房团”等套话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讨论巴黎华人天主教群体如何融入法国社会的问题时,我们同时要问的是:我们是在怎么看他们,是在如何将他们融入?

注释:

[1]本文英文稿为比利时鲁汶大学“Migration, Christianity and Identity-Construction”(Leuven, Nov.2009)研讨会论文,中文稿有增删。本研究得到了巴黎11大“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天主教巴黎华人堂区、以及诸多学术前辈的热心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

[2]广东省侨办调研团关于法国华侨社会的调查访问报告,《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初探》,载《侨务工作研究》,2004,4。

[3]在此期间,笔者基本上每个礼拜日、下午分别到13区和3区的华人天主教堂参加弥撒,其间与近30名教友进行了随机访谈。同时笔者选择对以下三类对象进行了多次访谈:5名在堂区服务的神父(包括1名自1955年以来一直在华人堂区服务的中国老神父、1名负责协助华人堂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和另外3名参与堂区工作的中国神父)、2名早期华人移民天主教“青年会”骨干成员、以及3名“新移民”家族领袖和青年教会骨干。由于教育程度、移民隐私等多种原因,笔者试图在堂区进行问卷调查的努力没有成功。

[4]其中包含法国汉学家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神父所收集的数据和未刊资料。

[5]据法国官方统计,1998年在法国的温州人已达139,800人。Ji, Zhe, “Territoires migratoires et lieux religieux: Cartes des religions des Chinois en Île-de-France”, in *Dieu change en ville: religions, espace et immigration*, Paris: L’Harmattan, 2010.

[6]《环球》杂志对皮卡尔的访谈,参见刘芳,《华人移民为何不能游行示威》,载《环球》,2004, No.5, 第68页;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The trafficking and exploit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France* (18 August 2005).

[7]See, *Immigration: une filière d’immigration clandestine chinoise vers l’Europe a été démantelée*, le Monde, June 15, 2002; *Une nouvelle criminalité prospère sur l’immigration irrégulière chinoise*, le Monde, Nov. 4, 2003.

[8]即现在的“法华中心”(Centre France-Asie)。

[9]李光华神父(Joseph Li), 祖籍河北献县, 1956-1977年任巴黎华人堂区本堂神父。

[10]张联毓神父(Cosme Chang), 祖籍湖北武汉,

1955年到巴黎, 1977-1983年、1994-2002年间两度任本堂神父。

[11]2009年4月3日访谈, 女, 57岁, 1974年从柬埔寨到法国, “青年会”成员。

[12]王贵神父, 高雄教区耶稣会传教士, 1983-1989年任华人堂区本堂神父。

[13]乐雅正神父(Thomas Elhorga, 1919-2001), 巴黎外方传教士。

[14]如在2009年2月1日, 华人堂区举办了盛大的“春节祭弥撒”。巴黎主教出席了活动, 并和堂区中国神父一道带领众人, 面对祭坛上的“巴黎华人列祖列宗牌位”烧香礼拜。

[15]2009年4月2日访谈, 张神父。

[16]2009年4月3日访谈, 女, 符大姐。

[17]2009年4月14日访谈, 男, 堂区老成员。

[18]这一经济上的矛盾并不是说堂区在经费上有困难, 实际上华人堂区教友的丰厚捐献常常令巴黎地方堂区的神父羡慕不已。

[19]Fr. Jean Charbonnier, “Les catholiques chinois à Paris”, 未刊材料。

[20]在华人堂区的一次弥撒上, 当辅祭的中国老神父听说主祭神父是来自中国爱国教会时, 当场脱下袍子就走了。2009年4月27日访谈, 男, 堂区早期成员。

[21]2009年7月26日访谈, 男, 大约40岁, 温州瑞安人, 来法国22年, 是新移民中的第一代, 长期在华人中负责移民安置和天主教华人堂区工作。

[22]2009年4月14日访谈, 男。

[23]See, *Le Monde* (13 September 2008).

[24]钟鸣旦(Nicolas Standard)与笔者的谈话, 2009年11月18日。

[25]“中华圣母堂”有厨房, 因此教友们在弥撒后可以共进午餐; 但St Elisabeth堂的教友则没有这个机会。

[26]在本次研讨会上, 社会学家Dr. Louise Ryan等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讨论。

[27]华人群体由于在巴黎11区集中经营而和当地居民形成紧张关系, 曾于2003年导致区政府公务人员罢工抗议和法国媒体的集中报道, 华人群体因此获得了“脏乱差”、只顾挣钱、不愿意融入法国文化的形象。

[28]因为连连遭遇打劫等安全问题, 2010年6月20日, 巴黎近3万华人在美丽城举行“反暴力、要安全”的游行。See, Vincent,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défile contre l’insécurité》, *Le Monde* (22 June 2010).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 比较文学系, 北京 100037)

(责任编辑: 张燕清)